

不舍积力，率性为道

——致敬平湖先贤、著名土木工程学家金问洙先生

■ 徐成校



金问洙

金问洙诗一首

矣”。

正是在这样的家学渊源之下，金氏后辈多有能人，金兆蕃的三个儿子皆成人。长子金问源，上海复旦公学首届毕业生，历任中央银行、交通银行总管理处秘书等职，曾为南社社员，晚年任上海市文史馆馆员。三子金问泗，1919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，曾任外交部总务司长兼代常务次长。金问洙先生便是金兆蕃先生的次子。

二、不慕荣利，尽瘁教育栽桃李

金问洙先生毕生与土木工程(测绘)结缘，其杏坛风雨，值得回味。

金先生于1905年考入复旦公学学习理科，1910年毕业，列高等正科理科第一名。1912年考入北洋大学(天津大学前身)，专攻土木工程学。1915年毕业后，历任上海中华书局编辑、太湖水利局绘图主任。1917年执教于安徽合肥第五中学。1918年应聘回复旦任数学教授。1921年，鉴于上海建设急需土木工程人才，复旦大学开始筹办土木工程系，这是复旦理科创办的第一个本科专业，金先生亲自教授应用

力学、水力学、水文学、钢筋混凝土理论、砖石工学、材料力学等专业课程，并总揽筹建工作。数年之内，复旦大学土木工程系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声誉，毕业生供不应求。正因为金先生的倾力投入，使土木工程系成为了复旦大学的著名大系，1923年学校授予其名誉理学硕士学位。

1952年夏，国家新建青岛工学院，调金问洙任院长。这一年，金先生已经62岁，他患有高血压症，听力不好，而且左眼已经失明，右眼近视1500度以上，并已丧妻，身边唯一的儿子金咸枫已于1950年响应国家号召到黑龙江工作，实际上他的个人生活存在诸多困难。但是为了执行党的指示，他毫不犹豫地迁出居住了数十年的上海，只身前往青岛赴任。青岛工学院白手起家，整套设计方案由金问洙先生主持绘制，迅速建成办学，培养人才，他拖着病体日夜操劳，师生为之感动。

1955年，国家进行第二次院系调整，决定停办青岛工学院，其测量专业则与同济大学、天津大学、华南工学院、南京工学院的测量专业合并，另新建武汉测量制图学院(1958年划归国家测绘总局，易名为武汉测绘学院)。青岛工学院的教职工及家属

数百人，须分调四处，金问洙先生对有顾虑者均予耐心接谈，深入了解，并尽量排忧解难，妥善安排。而于他本人，当时组织上拟留他任青岛市副市长，但他婉言谢绝，并表示：“愿继续从事教育，至于职位可无须考虑。”

1956年8月，66岁的金问洙先生离开青岛，随校赴武汉，担任了武汉测量制图学院副院长。该校的筹建，从审阅计划、踏勘校址到设计施工，仅用一年多时间，于1956年9月如期开学上课。这一功绩，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金先生，因为建校方案全面借鉴了原有青岛工学院的设计方案。新建的武汉测量制图学院，其它设施尚未完工，而全院师生员工又来自全国各地，生活习惯不尽相同，金先生废寝忘食，多方谈心谈话，关心关爱教师，积极解决难题，使教学迅速步入正轨。正是经过金先生等一批在测绘学上有深厚造诣的教授们的励精图治，使后来的武汉测绘学院成为了“世界测绘教育之都”。

三、爱国爱党，廉正诚厚为人师

在1981年7月，由159位复旦大学土木

工程系历届学生，为纪念金问洙先生创办土木工程系六十周年及先生九十诞辰而编的《率楼韵文集》的后记中写道——

先生……为国家培养工程人才勤勤恳恳、殚思竭虑，数十年如一日。先生为人正直不阿、不畏强暴、坚持正义……皓首耆年，犹渴求真理、努力学习，读马列之书，服膺共产主义，老而弥坚，终被接纳，为中国共产党党员。先生之教人，既以其言，更以其行。其言也，温文谦和，发自肺腑；其行则一如其言，纯出乎自然，故能感人深，使人移化。

诚然，纵观先生之言行，使人感佩。1935年“一二·九”运动中，金问洙先生支持复旦大学生参加上海学生运动，营救被捕学生，资助宣传经费。1936年，金先生制止军警在校寻衅，当局对此不满，但他毫无惧色。1941年，日军入侵租界，金先生辞去职务，闭门谢客。1946年夏，金先生调任他的母校北洋大学教务长兼代理校长，因不满国民党的倒行逆施，于1947年夏愤然离职。1949年上海解放时，他又积极发动上海教育界和水利界劝募物品慰劳人民解放军，陈毅市长授予“劳军模范”题字。1956年，他出席最高国务会议，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。1958年9月，在武汉市民进第二次会员大会上当选为主委，同年，已近古稀之年的金先生又被武汉测绘学院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。凡此种种，足可见金先生的可贵品质。1964年11月15日凌晨1时6分，金问洙先生在汉口逝世，享年73岁。在11月18日的追悼会上，周恩来总理送来了花圈，致以深切的哀悼。

金问洙先生曾在住院期间，预作了一对挽联，曰——

国德才学识，愧无片长。老死本寻常，岂有余音留过雁？ 念离合悲欢，都成陈迹。浮生逾七十，徒为盛世惜驹驹。

这是他的豁达自谦之词。总结先生的一生，用他的学生们的话最恰当——

若先生者，有力有学、无私无伪、品行纯正，诚不愧为人师表，又安得而不受人之景仰乎？

金先生逝世以后，其身前好友、平湖知名先贤许白凤先生写了一首《声声慢》的词，赋以志哀。这首词写得动情动容，催人泣下。文末，权且再用此词，怀念金问洙先生的音容笑貌——

音沉楚水，愁聚吴云，朱弦一恸谁调。老去悲秋，夕阳都在林梢。楼头黄鹤何去，怅翰飞、失陆鸣皋。春草句，料谢家诗梦，应有今宵。 廿载湖滨九宴，记篝龛言笑，桃李满树，引东凤、绿到柔条。才几日，怎闻声、凄报大招。

乍浦旧时慈善业札记

■ 赵鸿芳

购置田产13.197亩，交瑞祥寺僧典守，作为汤山下掩埋暴露尸骨之用；四十二年，王澄鉴、杨以梅创建瘞骸会，以收瘞无主之尸骨，力行不倦；五十三年，知县王恒捐俸，置周圩田6.8亩；五十四年，刘嘉瑞等置有司清文流周圩义冢，并和刘钦文、汪元久、邹瑚、陆嗣登、辜典韶、吴志道、徐光灿、郭美琦等劝募，购周氏厝楼六楹建同仁堂、施棺局，并收前项广孝阡内流周圩田21.974亩，作为同仁堂名下专为无主之尸施放棺木，收瘞地；道光元年(1821)有杨思高、盛凤鸣等劝募，购金安桥南方姓平屋两带，计8间，并捐义冢地70亩(原木场)，立东西二大义冢，病死而无人或无力收殓者，则会布施棺材为其掩埋。

与义冢收埋尸骨不同，义园是为寄棺柩之所。受传统的“落叶归根”观念影响，许多外来经商及满洲营官兵，希望死后能归葬故里，义园即因此在乍浦兴起。当年乍浦可停柩的义园有宁波籍的“四明义园”、温州籍的“东瓯义园”、台州籍的“赤城义园”和本地帮的“同昌义园”等。凡客死于他乡者皆得寄厝园内，待其亲者认领，运送回籍，加以安葬，“如寄棺年久无亲属属运回籍者，即于莹葬”。这些公益善举，体现对死者的尊重，也为当时乍浦的安定作出了贡献。

二、济贫助困

清代乍浦是杭州湾北岸唯一通商口岸，各地商人纷纷云集乍浦经商，并建立各种地域性和行业性会馆、公所，他们除了商业上互相依靠和支持外，在生活上也相互照顾，各大会馆均成立了“恤类社”，作为本行业的福利互助组织。凡是本会馆、公所所属的伙计、学徒都可申请加入，经费由本馆集资，会费则实行随缘乐助。一些经营获利较丰厚的商人，往往会给归属的会馆捐钱、捐产、捐物，做一些公益事业。特别在济贫方面，凡生活遇到特殊困难、年老无靠或客籍人遇难流落异乡的，均可得到救助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乍浦为清政府承担护送日本漂流难民集中遣送任务。据记载，入清以后，日本国漂流到中国各地的难民，甚至漂流到南洋各国的难民，几乎都被各省和各国护送到乍浦集中，然后由乍浦赴东洋办铜船只搭带回国。清嘉庆谕旨：“抚恤日本国遭风难民如例。”凡遇海难漂流到中国境内的难民，清政府命令各省地方官给予妥善安顿，处理残存货物与船只等，政府用公款发给漂流难民每人每日米一升，盐菜钱十文，并护送到乍浦集中，等候搭乘采办洋轮的商船回国。日本学者相田洋在《近世漂流民与中国》一文内附有《中国经过近世漂流民略年表》，列举了漂流中国境内61次海难事件中清政府对海外流民的安置情况，其中有44次经过东南各地，最后被护送到乍浦后搭乘中国商船回国。日本国文献亦有许多乍浦市民通日语、有些日本贡主在乍浦长居、乍浦市民对日本商人非常友好等记载。乍浦这些善举为后来的贸易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。

三、助学育婴

清代乍浦外贸兴旺，经济发达，文教日兴，地方政府与民间文士纷纷捐资助学，创办众多书院、私塾、义学等。最早是由元代名士陆正于陈山设立义塾，后由门人改为靖献书院，是当时海盐境内唯一书院，也是嘉兴最早的书院之一。

其次在清乾隆四年(1739)，乍浦海防同知林绪光集众创建观海书院(旧名九峰书院)，即今日乍浦小学的前身。书院几经兴废，直至清光绪十五年(1889)，里人徐胜昌捐资重建，头门三楹，汲古堂三楹及壁廊。二十五年，徐应良奉父命拓院后隙地建魁星阁及东侧建寒绿吟舫，同时，地方士绅捐田亩，合计可收租米169.7石，作为书院经费。书院先后有许河、徐熊飞、徐金镜、杨懋麟、何仍瑾、顾敬修等名流学者讲学其间，以研习儒家经籍为主，间亦议论时

政。清末废科举，改名学堂。书院是地方上或官办或民办或合办的教育文化组织，通常反映了一个地方的学术思想和文化水平。

满洲义学，嘉庆八年(1803)，清政府派遣众多八旗兵驻守乍浦。当时乍浦满洲营内的兵丁欲学汉文，但所得月饷微薄，无力延师训读，为此，乍浦水师副都统本智，照杭州满营之例，办义学，延请汉教习一名，每月只收取一点照明费，费用准在牧租项下支给。咸丰十一年(1861)遭兵燹停办。

乍浦学塾起源较早，遍及城乡。在清代乍浦贸易兴旺，百姓富足，想读书的百姓日益增多，故文士纷纷设馆教授，有倪瑞、汪彦彬、沈大林、施幼生等，有的私塾一直延续至建国初才停办。

除了助学外，一些乐善好施、急公好义的人士，积极捐资建乍浦育婴堂，救活不少贫家弃婴。

光绪二十四年(1898)，汪德济、范祝松、罗桂生、钟寿铭、朱祖授、许文照、林文熙、徐应良等募捐，对乍浦北门外原观海书院旧址的三进十五间屋进行改建，创办乍浦育婴堂。由汪德济等人轮流司年、司月，并雇用内外司堂各1人、乳妇若干人，经费除修屋余下2000元存钱庄生息外，还置当和圩田16.824亩，计租米17.3石，竹行弄所置平屋出租利息和乍浦各商每月捐助，充育婴堂常年经费。育婴堂的建体现了当地士绅对贫困孤儿的关爱。

四、修路筑桥

明末清初乍浦名儒周宏祖曾言：“生死海中念佛第一，人天路上作福为先，福缘之大莫如便民。”便民在水乡泽国就是筑桥。建桥、修桥作为地方公益性善事，比起建寺庙、兴学校、办慈善救助等善业更能惠及他人，如果建的是石桥，坚固耐久，可存续千百年，功德可谓大矣。

据记载，乍浦城形正方，市区衢衢四通八达，街巷纵横交叉，“街各有巷，由巷度小

街，又有子巷”，凡街巷均铺以碎石。清乾隆五年(1740)，澈浦僧大矾募白金数千两，自四牌楼而南抵海口，俱铺条石，下泄泔水沟，其余街弄亦先后由里人募金改铺。据清光绪十二年(1886)《平湖县志》载，乍浦城有街、路、弄87条，然因几经兵，房屋毁坏严重，致不少街弄已成僻径田塍。二十七年(1901)二月，乍浦丁瑞澜发起募捐二千五百余元，重修火神弄而西至巷湾的南河滩沿河街道，雇工购料，动工兴建，共费银一千六百多元，又以余银修迎龙桥、金安桥，将破烂不堪、摇摇欲坠的二桥木栏改为铁栏，得到行人的称道。乍浦是水乡，桥梁接通河网，城内大大小小有18座，有些桥梁由于年久失修，存在安全隐患，得到乍浦义士捐资重建或修建，如启元桥、永丰桥、永福桥、西石桥、兴隆桥等。

五、赈灾利民

乍浦慈善业向来得到地方大家族的大力支持，道光二十九年(1849)，乍浦遭受水灾，发生饥荒，斗米千钱，乍浦里人陈佩莲，倡议劝捐赈济，活者万计，事情上报朝廷后，钦颁“乐善好施”匾额。其他如夏天施药，冬季施棉衣，准备水龙以防火灾，疏通河渠以防水患等社会公益事业，体现了深受儒家文化浸淫的绅士风范。

说到庵、寺，宗教在意识形态上虽然有强烈的迷信色彩，但其教义和事业具有明显的公益倾向。如：乍浦观山的普照庵，据《乍浦志》记载：清康熙二十三年(1684)弛海禁，海舟商舶到乍，屡有岩石触舟，颇危险，即在山顶建普照庵(久圯)设竿悬灯，以指夜航，故俗称灯光庙，道光二十年(1840)，废于英患。清末民初，山顶复建联辉阁，中奉魁星。嗣由乍浦人徐胜昌于阁之上层设置塔灯，雇人管理，以信航海，他们替乍浦政府做了一些护国利民的事。

综上所述，乍浦慈善事业经过明清的发展，已经初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慈善体系。这种官民合作并共同致力于慈善事业的模式，有利于地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。